

九一八事变后的英国与国联调查团组建

——基于英国档案文献的考察

陈海懿 徐天娜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派遣调查团赴远东开展调查,这是国联介入中日战争的开始,研究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是探究国联与中日战争联结的必然需求。作为国联主导国之一的英国在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内阁、英国驻中日使领馆、英国驻国联代表团在该过程中构成了三方主体,并在国联调查团的“提议—预演(派遣观察员)—正式组建”三个阶段中发挥了实效作用。本文通过爬梳英国档案文献发现,与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同时进行的是英国远东策略基调的演进过程、派遣观察员的外交互动过程和主导国联的政治权衡过程,国联调查团的组建离不开英国因素。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英国;国联调查团;国联理事会;观察员

【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9)04—0170—16

【作者简介】陈海懿,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210023;徐天娜,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10023

1931年6月2日,英国外交部曾就其全球外交政策制定了备忘录,并提出英国所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其中第七项是以中国和日本为分析对象的远东外交政策。尽管英国外交部在中国板块中确认了英国“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和行政完整性”的外交政策,但在日本板块中明确指出“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准备……与中方讨论满洲铁路的突出问题。但是,他们不希望外部国家以任何方式干涉”,^①英国已经意识到中日双方因中国东北地区铁路问题发生争端时,日本将反对第三方的干涉。九一八事变后初期,中日两国围绕国联或第三方势力是否可以介入中日冲突展开了激烈的外交斗争,中国强烈要求国联介入与日本坚决抵制反映了中日两国对九一八事变所体现的“国际性”^②的不同认知,这也充分印证了英国在九一八事变三个多月前的评估。

此轮中日博弈的阶段性的结果是国联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有关英国与国联调查团组建之间的关联性仅在英国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中被简单提及。中外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叙述脉络中梳理英国对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整个中日冲突的因应,基本上按照九一八事变到锦州被轰炸、锦州被轰炸到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到李顿调查报告书、李顿调查报告书之后等四个阶段来分析英国的策略演变及其绥靖政策在远东地区的实施,其结论则没有偏离英国殖民主义思维、英法为主导的国联有名无实、惧怕苏联共产主

① “The Foreign Policy of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gether with a list of commitments arising out of that policy or the foreign policy of other nations”, June 2, 1931, The Cabinet Papers (CAB) 24/225/17, The National Archives (Similarly Hereinafter), p. 42.

② 有关中日冲突的“国际性”和中日两国在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中的立场态度分析,可以参见陈海懿、郭昭昭《国际性与主体性:中日冲突和国际联盟调查团的产生》,《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3期。

义、欧洲优先等解释范畴。^①

然而,从微观历史的角度深入研究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因应,可以呈现出更加具象的历史面相,九一八事变从双边“中日冲突”上升为多边“国际事件”的关键节点,在于中国诉诸国联与国联派遣调查团。在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中,作为国联主导国的英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英国驻中日两国使领馆的官员积极报备中日冲突,为英国外交部决策提供了远东情报,而且当时的国联秘书长英国外交家德拉蒙德(James Eric Drummond)、英国驻国联常任代表塞西尔(Edgar Algeron Robert Gascoyne-Cecil),以及英国的两任外交大臣李定(Rufus Daniel Isaacs, 1st Marquess of Reading)和西蒙(John Allsebrook Simon),都在国联调查团组建的过程中施加了重要影响。

基于上述考量,本文拟利用英国外交档案(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英国内阁文献(The Cabinet Papers, CAB)、国联公报(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LNOJ)以及中日美相关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回到1931年9月18日至12月10日的历史现场,把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提议—预演(派遣观察员)—正式组建”,以此作为时间线索和研究场域,从而探究作为国联主导国的英国在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中的外交运作与政治权衡,揭示英国对外政策与远东局势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一步加深国联与中日战争的研究厚度。

一 中日冲突初期的英国应对与策略基调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洲铁路轨道,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迅速侵占了沈阳,并将军事行动不断扩大至东北全境,此为20世纪30年代中日冲突的关键起点,其重要性被视为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日战争的开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的国际背景是资本主义国家深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英国的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内阁财政状况极为恶劣,不得不于9月21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实行英镑贬值。^②

针对九一八事变,英国内阁最早于9月22日进行了讨论,后直到11月10日内阁才再次提出讨论,因此有必要分析英国内阁在1931年9月22日召开的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情况。此次内阁会议由枢密院院长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主持,首相麦克唐纳因病缺席,参与会议的有外交大臣李定等十余名内阁成员。会议总共讨论了十项议题,其顺序是根据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排定,“中日在满洲的行动”议题位于第四项,前面三项分别是禁止购买外汇、财政状况报告、食物供应等经济问题。在讨论“中日在满洲的行动”的议题中,外交大臣做了情况通报,主要有以下五点:一、中国已经要求国联解决日本占领满洲之问题;二、英国驻国联代表塞西尔的目的应该是要求双方军队撤退至条约所规定的特定线之外;三、由军事武官充任的观察员会被派往现场以

^① 参见王纲领《英、美二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回应》,刘维开主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1992年;王宇博《英国、美国与“九·一八”事变》,《史林》1999年第2期;赵岚《“九·一八”事变后英国、国联对日政策演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4年第5期;梁敬镗《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石井摩耶子《國際連盟と満州事変——イギリス外交を中心にした素描》,《歴史教育》1967年第15卷第2期;小林啓治《満州事変とイギリスの東アジア政策》,《日本史研究》1990年第338期;臼井勝美《満洲国と國際連盟》,吉川弘文館1995年版;加藤陽子《満州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へ》,岩波書店2007年;緒方貞子《満州事変:政策の形成過程》,岩波書店2011年版;Sandra Wilson, “Containing the Crisis: Japan’s Diplomatic Offensive in the West, 1931—1933,”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29, no. 2, pp. 337—372; Sara R. Smith, *The Manchurian Crisis, 1931—193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Roger Louis, *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 1919—1939*,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London: Hamilton, 1972; Ian Nish, *Japan’s Struggle with Internationalism: Japan, Chin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31—1933*,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Ltd, 1993.

^② 参见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29页。

查看上述要求是否得到实现;四、强迫美国支持该行动;五、转告日本驻英大使关于英国所采取的路线。^① 归纳起来英国的策略包括三点:其一是由国联处理中日冲突,其二是派遣观察员赴现场监督撤军,其三是拉拢美国;可见英国判断中日冲突可以在国联框架内得到解决。

英国之所以在9月22日采取这样的策略基调,原因除了英国受困于本国经济危机之外,其所获知的有关中日冲突的信息和中日冲突的发展趋向影响了英国的远东策略,后两点主要是基于英国驻中日使领馆的信息报备和中国主动申诉于国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英国驻中国公使兰普森(M. Lampson)和驻日本大使林德利(F. Lindley)都向外交部发送了多封电报,两者对九一八事变初期的差异性报备不仅反映了中日两国各自对外交使节评估突发性事件的影响,而且提供了英国外交部在决定远东策略基调时的信息参考。

9月19日凌晨1点,兰普森从张学良的顾问端纳(W. H. Donald)处得知日本军队袭击了沈阳,“至少八十名中国士兵被杀……电话和无线通讯被切断”,端纳还表示“日本军队肯定疯了,而日本领事宣布无法控制局势”,兰普森将此信息转告英国外交部,同时告知由于自己在前一天晚上还与张学良共进晚餐,所以“少帅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他接到命令后就要求所有的中国军队在仓库里缴械,避免任何形式的报复或挑衅”。^②

9月19日稍晚时分,张学良再派顾维钧拜访兰普森以讨论局势,顾维钧告知张学良及其顾问们的设想是“根据《国联盟约》或《九国条约》进行申诉”,并希望知道“英国政府是否会准备在该事件上采取主动”。兰普森基于“英国与日本关系密切的特殊立场,英国政府将不太可能采取任何单独行动”的判断,向顾维钧回复道“无论如何,英国政府首先想知道的是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已经向英国驻沈阳总领事发了电报,正在等待核实和完整的报告”。顾维钧在离开时特意表示九一八事变可以促使南京国民政府迅速和令人满意地处理索伯恩案(John Thorburn Case)^③,兰普森对此表示同意,“如果南京政府现在不立即与我们处理该案件,他们是愚蠢的”。^④ 在此次谈话中,顾维钧表达了希望英国出面干涉的意愿,同时以加快处理索伯恩案来换取英国的积极性,兰普森亦得知了中国有意根据国际条约进行申诉,但英国最迫切的是需要获取关于事变的实地情报,这一迫切需求贯穿于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的始终。

与兰普森进行报备的同时,林德利也发送了多份电报,阐释自己和来自日方的观点。在9月19日一封未印刷的电报中,林德利告知“日本媒体一致支持在满洲采取行动,但希望该冲突可以被局部化,可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9月20日,林德利向外交部表示他“倾向于认为关东军总参谋长或者司令长官抓住了中国人攻击铁路的借口,在没有日本政府授权的情况下,让军队尽可能多地占领要地”,“如果日本政府知道了这个情况,军事行动就会被停止”。^⑤

9月20日,张学良又拜访了兰普森,告知其已经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由驻日内瓦的中国代表立即向国联提出中日冲突问题,并催促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把日本人带到公开场合”,兰普森继续表示“除非英国更清楚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否则英国政府是不会有any看法的”。^⑥ 兰普森

① “Meeting of the Cabinet to be held at No. 10 Downing Street, S. W. L., on Tuesday, September 22, 1931, at 11.0 a. m.”, 22 September 1931, CAB 23/68/15, p. 4.

② “NO. 506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19, 9.30 a. m.)”, 19 September 1931, F 5014/1391/10,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DBPO).

③ 关于英国人索伯恩失踪的案件始末可以参见 R. A. Bickers, “Death of a Young Shanghaider: The Thorburn Case and the Defence of the British Treaty Ports in China in 1931”,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0, no. 2 (May, 1996), pp. 271—300.

④ “No. 507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19, 12.5 p. m.)”, 19 September 1931, F 5033/1391/10, DBPO.

⑤ “No. 508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0, 4.50 p. m.)”, 20 September 1931, F 5038/1391/10, DBPO.

⑥ “No. 510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0, 6.0 p. m.)”, 20 September 1931, F 5076/1391/10, DBPO.

在这一天还接到了英国驻南京总领事阿维令(Aveling)的报告,他告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已经向其口头传达了国民政府将向国联提出申诉,“中国政府……愿意向《国际盟约》和《凯洛格条约》签署国披露所有事实……外交部长要求你向英国外交部转达他对负责任大国不允许公开藐视神圣国际协定的信心”^①,兰普森将这些信息都报备至外交部,并转发给东京大使馆。

当林德利得知中国有意向国联申诉后,他认为英国政府应该注意以下两个事实,“一是中国人在满洲实施了最恼人的政策,即不断地试图破坏日本基于条约权利所取得的地位;二是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将可能有利于英国在中国的利益”;^②同时告知日本内阁正在开会商议应对措施,“问题集中于是否应该立即从占领地区撤退,陆军大臣强烈反对撤退”,^③外务大臣和陆军大臣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

除了来自英国驻外领事馆的报备,中国驻英国的临时代办也传达了一些信息。9月21日,中国临时代办拜访了英国外交部官员麦基洛普(MacKillop),强调“由于日本军队在满洲不同地点的军事行动是如此完美的同步,所以日本的行动是事先精心准备的”,并询问英国政府是否会采取“态度”或形成“意见”,麦基洛普以情报不足为由进行答复,“迄今为止的情报可能不足以做出任何判断”。^④需要搜集更多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实地信息情报尽管成为了英国拒绝明示立场的说辞,但也反映了英国对信息的渴望。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就按计划申诉于国联。9月19日,外交部长王正廷致电在南昌的蒋介石,提议“当由本部(外交部)电令驻日汪代办及向日使重光提出严重抗议,并一面电日内瓦施代表在大会宣布日方谋我真相,要求召集行政院……迅予必要之措置,再将此事向英美法意等非战公约签字国正式通告”。^⑤该建议获得蒋介石的批准后,9月20日,外交部致电时任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要求其“正式求国际联合会立即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⑥第二天,施肇基正式向国联秘书长提出书面申请书,“为奉本国政府命令,请贵秘书长注意下列事实,并请根据盟约第十一条,立即召集国联行政院会议,以便采取最良善有效之方法,保障国际和平”。^⑦

9月22日上午,国联理事会第65届常会第二次会议正式讨论中国提交的申诉。施肇基明确提出可以通过国联任命的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以获取真实情况,反对日本提议的中日直接谈判,“在中国领土被日本军事占领之下,如何能够进行直接外交谈判”,恢复原状是谈判的前提,^⑧而国联会议中对中国的“空气极佳”,中国驻日内瓦代表亦希望国民政府“坚持由国际联合会解决,勿承认直接交涉”。^⑨英国驻日内瓦代表贾德干(Alexander George Montagu Cadogan)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了

① “No. 512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1 , 2. 15 p. m.) ” , 21 September 1931 , F 5042 / 1391 / 10 , DBPO.

② “No. 509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0 , 3. 15 p. m.) ” , 20 September 1931 , F 5031 / 1391 / 10 , DBPO.

③ “No. 516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2 , 9. 30 a. m.) ” , 22 September 1931 , F 5049 / 1391 / 10 , DBPO.

④ “No. 513 Record by Mr. MacKillop of a conversation with Dr. Chen” , 21 September 1931 , F 5111 / 1391 / 10 , DBPO.

⑤ 《外交部致南昌行营蒋主席电》(1931年9月19日,《外交部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等接洽中日纠纷之文电》,外交部档案,入藏号:020000001439A,数位典藏号:020—010102—0183,第6—7页,台北“国史馆”藏。国联行政院即国联理事会(The Counci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国民政府在记述中常使用“行政院”,下同。

⑥ 《外交部致国际联合会施代表电》(1931年9月20日,《东省事变声请国联》,外交部档案,入藏号:020000001403A,数位典藏号:020—010112—0034,第17页,台北“国史馆”藏。

⑦ 《中国代表团对国际联合会秘书长提出之书面申请书》,《东省事变声请国联》,外交部档案,入藏号:020000001403A,数位典藏号:020—010112—0034,第18页,台北“国史馆”藏。

⑧ “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 Second Meeting (Public) ” , 10. 30 a. m. , 22 September 1931 ,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LNOJ) , pp. 2267—2268.

⑨ 《日内瓦吴凯声致外交部电》(1931年9月22日,《东省事变声请国联》,外交部档案,入藏号:020000001403A,数位典藏号:020—010112—0034,第38页,台北“国史馆”藏。

中国的申述 随后英国召开了前文所提及的9月22日内阁会议 讨论了九一八事变 同时主导国联理事会授权理事会主席向中日外长发出第一次通告 要求 (一) 请求中日两国政府停止一切行动……(二) 商同中日代表觅得适当办法 俾使两国将各本国军队立即撤退 同时不妨碍各本国人民之治安及其所有财产之保护”。^①

综上 在英国自身受困于经济危机难局之际 英国驻中日使领馆的信息报备和中国诉诸国联为英国内阁的远东策略确定了基调 具体而言: 1. 兰普森的报备反映了英国外交部迫切希望能够获得关于中国东北的实地情报; 2. 林德利的报备使英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利弊难以把握 并一定程度上认为日本政府能够控制局势; 3. 中国主动提出依靠国联和《国联盟约》来处理 英国正好顺势从之 而中国提议的调查也符合英国的诉求。

二 调查团的提议: 中国申诉国联与英国主导议决案

在9月22日的会议中 施肇基已经提出关于调查团的提议 但是日本坚持中日直接谈判 反对第三方的干涉 并威胁“过早干涉”将会造成刺激日本公众舆论的不良后果 阻碍和平解决事变。^②除了施肇基 法国与英国驻国联代表团中也有人附和调查团提议。当时的国联大会筹备举办军缩会议 第三委员会正在讨论起草一份旨在阻止战争发生的条约 该条约草案的第四条规定“理事会如认为合适……则任命调查团”。^③

在9月22日理事会开始之前 英法与日本曾私下进行会谈 法国驻国联代表团成员马西格利 (René Massigli) 向日本驻国联代表团成员佐藤尚武提议法国驻东京大使馆的军事武官应该出发前往东北 调查九一八事变实情。佐藤对此感到震惊 表示“日本政府和人民不会理解外国观察员的干预” 并将此视为法国试图介入解决事变的谈判。英国代表贾德干支持马西格利的提议 并向外交大臣李定询问是否赞成以上行动。^④李定在回复中明确表示“赞成撤军 并在一个以准备直接谈判为目的的提议中提出派遣观察员”^⑤ 故而当时的日内瓦充斥着派遣调查员的舆论 “倘日军之占据沈阳事出仓卒 日政府事前未有所闻 则希望日本立即撤回军队 然后由国联理事会推选列强远东外交代表组织调查委员会 协合中日政府解决此事”。^⑥

在李定的指示之下 英国驻国联常任代表塞西尔于9月22日的理事会中指出“我们缺乏必要的事实信息以达成观点 中日两国所提交的说明在事变的起因和内容上存在本质区别”^⑦ 意在派遣调查团以获取信息。英国驻国联代表团在向外交部汇报理事会会议情况的电报中表示 理事会决定请中日代表尽快确定各自政府是否会反对派遣有能力的观察员(包括军事武官或行政人员)到中国东北 并向理事会提交关于局势的报告 这些观察员来自中日以外的国家 但对中日双方都很友好。^⑧王正廷随后向兰普森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塞西尔在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的感谢和对国联做出

① 《外交部致北平张副司令电》(1931年9月23日) 《东省事变国联之决议与措置(一)》 外交部档案 入藏号: 02000001401A 数位典藏号: 020-010112-0030 第4页 台北“国史馆”藏。

② “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Second Meeting (Public)”, 10.30 a. m., 22 September 1931, LNOJ, p. 2267.

③ 参见英国内阁与国防委员会秘书汉基 (M. P. A. Hankey) 在1931年12月10日向英国内阁提交的备忘录文件, “Reduction and Limitation of Armaments; The Model Treaty to Strengthen the Means of Preventing War”, 10 December 1931, CAB 24/225/12, p. 20.

④ “No. 514 Mr. Cadogan (Geneva)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2, 12.30 a. m.)”, 22 September 1931, F 5054/1391/10, DBPO.

⑤ “No. 515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Mr. Patteson (Geneva)”, 22 September 1931, F 5054/1391/10, DBPO.

⑥ 《国联中日代表 各有宣言发表 国联要人主从调查入手》, 《申报》1931年9月22日 第8版。

⑦ “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Second Meeting (Public)”, 10.30 a. m., 22 September 1931, LNOJ, p. 2269.

⑧ “No. 519 Mr. Patteson (Geneva)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3, 9.0 a. m.)”, 22 September 1931, F 5071/1391/10, DBPO.

的决定的满意,表示中国将忠诚地合作。^①

9月23日,塞西尔再向李定报告法国政府已经向驻日本大使发去电报,要求后者向日本外务省表明满洲局势的严重性,强调“国际联盟所有成员有尊重国际承诺和履行理事会建议的义务”,并询问日本政府是否接受由理事会派遣观察员到事发地点。塞西尔还提到德国和意大利也会向本国驻日本大使发电,因此敦促英国政府立即向驻日大使发出类似的信息。^②李定接受了塞西尔的建议,随后发电要求林德利采取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驻日本大使相同的行动。^③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英国接受中国的吁请,赞成派遣调查团获取信息,同时将此视为国联的权利,而日本则有接受的义务。

但事情随后的发展却背离了原先的轨道,调查团提议并没有写入国联理事会在9月30日通过的决议中。林德利在接到李定指示后,发现法国等驻日本大使并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命令,因此没有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声明,只是于9月24日非正式地会见了日本外务副大臣,表示英国最期待日本政府满足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意愿。^④林德利还汇报法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具有明显的亲日立场,“日本的激烈行动对法国及其他国家在中国的利益是有益的”。^⑤日本内阁在9月25日也通过了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声称“决定采取极力遏制事态扩大的方针”,强调“帝国政府对满洲不存在任何领土的欲望……恪守重视日华善邻友好的既定方针,并将断绝发生破坏国交的不详事件发生的祸根”,^⑥林德利表示日本内阁的声明叙述了日本视角中的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和此后事件的发展情况,但不涉及国际联盟的干预。^⑦

在日本内阁发表声明后,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会见了林德利,专门谈及了日本对国联派遣观察员的立场。币原表示观察员提案“将导致军方与文官政府爆发公开冲突”,并且透露在此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都愤愤不平地询问是哪个政府提出了观察员意见,若记者们被告知这是英国政府的建议,那么东京的报纸将以巨大的头条新闻来攻击英国。林德利被币原的信息所刺激,向外交部汇报称“日本已经下定决心,只能单独与中国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在满洲的行动中已经冒了巨大的风险”,意思是日本已经为九一八事变付出了很多,坚决反对国联干涉,同时警示英国政府需要意识到“国际联盟面临着一种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被拒绝的危险”。^⑧总之,在林德利看来,“中国拒绝谈判的风险很大”,^⑨同时“日本是决心独自与中国处理九一八事变”。^⑩

林德利的电报对英国调整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电报所反映出来的三点信息使李定感到焦虑:首先是法国驻日本大使非但没有收到塞西尔所称的电报,而且法国驻日本大使馆官员具有亲日立场;其次是日本外相币原几乎将英国视为观察员提案的发起国;再次是日本始终没有偏离直接

① “No. 519 Mr. Patteson (Geneva)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3, 9.0 a. m.)”, footnote 3, 22 September 1931, F 5071/1391/10, DBPO.

② “No. 520 Mr. Patteson (Geneva)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3, 9.20 a. m.)”, 23 September 1931, F 5094/1391/10, DBPO.

③ “No. 523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Sir F. Lindley (Tokyo)”, 24 September 1931, F 5094/1391/10, DBPO.

④ “No. 526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4, 2.30 p. m.)”, 24 September 1931, F 5127/1391/10, DBPO.

⑤ “No. 527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4, 4.0 p. m.)”, 24 September 1931, F 5128/1391/10, DBPO.

⑥ 《滿洲事變に關する政府第一次聲明》(1931年9月24日),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原書房1955年版,第181—182頁。

⑦ “No. 528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5, 9.0 a. m.)”, 25 September 1931, F 5131/1391/10, DBPO.

⑧ “No. 531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5, 6.0 p. m.)”, 25 September 1931, F 5146/1391/10, DBPO.

⑨ “No. 536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8, 3.40 p. m.)”, 28 September 1931, F 5208/1391/10, DBPO.

⑩ “No. 537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28, 4.0 p. m.)”, 28 September 1931, F 5207/1391/10, DBPO.

谈判的立场。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驻英国大使松平恒雄向李定正式提出“日本政府关心的是从国联或其他地方派遣观察员的建议。日本人民会误解这个建议,认为这是干扰日本政府维护其条约权利的努力”。^①日方的表态不仅偏离了李定所设定的英国不介入而依靠国联框架来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基调,而且将英国视为带头国家。因此,李定一方面向塞西尔询问为何法国驻东京大使没有收到9月23日第520号电报中所描述的指示,^②另一方面向林德利发电报以解释日本对英国的“误会”。首先,李定表示英国“一直在争端中保持对双方公正态度,出于重视英中和英日友好关系的重要性,英国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被日本或中国视为已经对他们做出判断的行动”;其次,李定称“英国特别不希望首先发起声明”,并将观察员提议推给法国,据第514号电报可知“观察员提议是由法国提出来的”;再次,李定表示难以理解为何法国驻日本大使尚未对法国政府9月23日发出的指示做出任何表示,要求林德利再次确认法国大使是否做了这样的声明;最后,李定要求林德利在合适的时候向币原外相口头说明英国政府的立场,让日本政府了解到是“其他国家政府采取类似行动……派遣观察员的建议并非由英国政府或任何英国官员提出”。^③

关于为何法国驻日大使没有按照“指示”在英国之前向日本发出声明而使英国被日本视为带头国家,根据10月10日英国驻法国大使蒂勒尔(Tyrrell)发至外交部的电报所示,法国政府没有在9月23日向驻日本大使发送塞西尔所说的“指示”,马西格利表示自己在国联中并不像塞西尔一样享有全权,法国外交部并没有实施其所提交的建议。对于这个外交上的“误会”,蒂勒尔表示“日本人在这件事上不单单让两个欧洲大国产生分歧,而且事实上我们采取了法国没有采取的行动”,似乎是“被日本大使馆蓄意利用的”。^④

林德利根据李定指示,向日本外务省做出解释,将英国的论调降低为提醒“日本作为国联的主要成员,有接受观察的义务”。^⑤与此同时,国联理事会也来到了休会期,英国根据上述形势发展和国联理事会辩论情况,主导了国联理事会第一个关于中日冲突的议决案。9月30日下午,议决草案提出后,中日两国再次就是否派遣调查团进行了辩论,施肇基提出如果到10月14日日本还不能够实现完全撤军,那么国联应该考虑采取其他措施,包括“派遣调查团和就地协议”,^⑥但该议决草案基本回避了日本所担忧的国联派遣调查团内容,仅在决议的第九段模糊规定“行政院授权于其主席,经向各同僚尤其两关系国代表咨询后,认为根据从当事国或其他各会员方面,所得关于情势进展之消息,无须再行开会时,得取消本院十月十四日之会议”,^⑦涉及当事国或其他会员国获得关于中国东北情势进展的内容。

总结这段时期内的英国远东政策转变,可以发现当英国外交部发现情势超过9月22日内阁设定的处理中日冲突的政策基调时,立即予以调整,重新拉回国联框架内,以扭转英国被日本视为“领头羊”的形象,缓和英日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派遣观察员和第三方是否介入中日冲突成为了局势变更的关键。当国联通过“9·30”议决案后,林德利就评论道“目前的状况是日本成功地抵制了中国试图将第三方引入谈判以求解决的企图”,而日本一直试图把九一八事变当作纯粹的地方事

① “No. 542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Sir F. Lindley (Tokyo)”, 29 September 1931, F 5325/1391/10, DBPO.

② “No. 529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Mr. Patteson (Geneva)”, 25 September 1931, F 5131/1391/10, DBPO.

③ “No. 538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Sir F. Lindley (Tokyo)”, 29 September 1931, F 5146/1391/10, DBPO.

④ “No. 605 Letter from Lord Tyrrell (Paris) to Sir R. Vansittart”, 10 October 1931, F 5689/1391/10, DBPO.

⑤ “No. 543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September 30, 11.30 a. m.)”, 30 September 1931, F 5146/1391/10, DBPO.

⑥ “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Seventh Meeting”, 4 p. m., 30 September 1931, LNOJ, p. 2308.

⑦ 9月30日议决案共有九条,可以参见自上海明社出版部编印《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1932年,第1—2页“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Seventh Meeting”, 4 p. m., 30 September 1931, LNOJ, Vol. 12, Iss. 12, 1931, pp. 2307—2308 《滿洲事變に關する國際聯盟理事會決議》(1931年9月30日),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第183—184頁。

务来对待,“将坚持与中国单独谈判”。^①不过,中国没有放弃呼吁国联或第三国派遣观察员的努力,借助于“9·30”议决案第九段的内容,中国向英美等多国发出了恳请派遣观察员前往中国东北获取“情势进展之消息”,并将之提供给理事会主席的外交照会,于是就有了作为“预演”调查团组建的观察员派遣过程。

三 调查团的预演:英国派遣中立观察员的外交过程

在国联通过“9·30”议决案后,南京国民政府依然坚定地依靠国联,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特外委)在10月1日的第二次会议中议决,“中国对于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②确定了继续寻求国联介入的策略。10月3日,国民政府向美国发函称“鉴于美国是1928年《非战公约》的签字国……中国政府真诚地请求美国政府采取类似的立即行动,派遣代表搜集满洲日本军队的活动情报,并将之电达本国政府和民众。”^③10月4日,国民政府又向英国驻南京代表英格拉姆(Ingram)要求派遣国联理事会会员国代表前往中国东北收集局势情报,表示“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国联理事会成员国的政治和军事代表在满洲的存在……收集关于撤军进展和所有相关情况的情报,每天向国联秘书处通报,以使理事会充分认识到这些事实”,恳请能够“提供英国政府代表的姓名”。^④除英美之外,国民政府向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都发出了类似的外交照会。

事实上,英国方面在接到国民政府的请求之前,其沈阳领事馆的军事武官已返回北平,汇报了中国东北局势,并讨论了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强调自己“目睹到的是占领而不是撤离”。在搜集情报过程中,英国军事武官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份,决不让日本人认为其行为超出了正常的军事武官职责范围之外。^⑤但是,在英国等国家接到国民政府的外交照会后,这种观察员派遣行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因为是否是响应中国的请求予以派遣,以及是否要向国联汇报观察所得信息,都涉及到是否属于国联或第三方介入中日冲突的范畴。

10月5日,本来已经准备再派遣军事武官和使馆秘书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并报告日本撤军进展情况的兰普森主动约集美国、法国、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等使馆负责人员,商讨了关于中国政府呼吁各国派遣代表前往中国东北的建议。兰普森表示他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人正试图诱导我们进行国际联盟理事会已经拒绝的一系列行动”,而且“中国的建议使事情变得复杂,使我们更难做一些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西班牙公使和德国公使都表示已将中国外交部的建议转达给本国政府,正在等待指示。法国公使也表示正在向法国政府汇报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消息。美国公使则表示基于《非战公约》的义务,美国在收到中国外交部电报之前就派遣了两名代表前往中国东北。此次多国公使商议的结论是:各国应派遣代表去现场,以报告情况发展,但鉴于中国采取的策略明显是让各国认可中国对“9·30”议决案第九段的解释,各国应谨慎行事,避免任何形式的正式调查团。^⑥

^① “No. 550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November 3)”, 1 October 1931, F 6279/1391/10, DBPO.

^②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1日),刘维开主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9—10页。

^③ “Telegram from the Acting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in Nanking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at Peiping”, October 3, 1931, Conditions in Manchuria, House and Senate Documents, Serial Set Id: 9520 S. doc. 55, pp. 12—13.

^④ “No. 556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5, 9.0 a. m.)”, 5 October 1931, F 5381/1391/10, DBPO.

^⑤ “No. 557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5, 9.0 a. m.)”, 5 October 1931, F 5374/1391/10, DBPO.

^⑥ “No. 558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5, 5.10 p. m.)”, 5 October 1931, F 5388/1391/10, DBPO.

在兰普森等待英国政府的指示之际,国联表达了对获取中国东北信息的迫切期望。10月6日,英国驻国联代表团向李定汇报德拉蒙德的抱怨“除了日本和中国的消息外,还没有任何信息到达理事会……难道北京公使团不能联合起来去获得可信的信息吗?”^①在此背景下,李定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向驻法国、中国、日本、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大使都发出了电报。首先,要求驻法大使蒂勒尔向法国政府建议采取派遣观察员的行动,理由是“中国人的情绪明显激化,需要采取一些可以对中国政府产生抑制作用的行动,这种行动的一部分是通过适度劝说,另一部分是尽可能地满足中国政府关于派遣中立代表到中国东北的请求,这是非常可取的”,但也表示这些观察员“将向各自政府报告,而不是直接向中国政府所设想的国联理事会报告”,明示如果法国政府愿意指示其驻中日的代表采取上述行动,英国将立即跟进。^②其次,向兰普森和林德利发去指示,如果法国驻中日代表采取了行动,英国代表“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③再次,致电驻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大使询问各所在国的政府是否会采取类似的行动。^④

从李定的行动中可以看到,英国外交部的设想有三点:一是想要实施派遣观察员的计划,获得更多关于中国东北事态发展的信息;二是力求避免成为第一个采取派遣观察员行动的国家,以免被日本政府视为领头者;三是规定观察员向本国政府而不是国联理事会报告,以弱化观察员的性质问题。

关于此时是否应该派遣观察员,最接近事发地的英国驻外使节代表——兰普森和林德利——都表示赞同。10月7日,兰普森向李定报告法国驻华公使已经收到了法国政府的指示,尽管该指示是要求“继续依靠法国在中国东北的正常渠道,即法国驻沈阳的领事”,但兰普森和该法国公使都认为“鉴于严峻的形势,毫无疑问,派遣观察员以自由旅行的方式去观察满洲事件的发展……是非常可取的”,因此兰普森建议“如果我们想得到真实的东西,不管法国人是否实施,我个人倾向于应该派遣我们的人”。^⑤林德利亦表示尽管日本的法国大使没有收到指示,但其个人认为“日本不可能反对英国从北平派遣观察员前往中国东北,该观察员是向英国政府而不是国联报告”,^⑥不过在支持派遣观察员的同时,林德利还是没有改变其主张中日谈判的坚定立场,仍然向英国外交部强调催促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进行直接和迅速谈判的重要性,“鼓励中国推迟开展与日本的直接谈判,是我们向中国提出的最不好建议”。^⑦

德拉蒙德也在这一天同贾德干和施肇基谈论了关于派遣观察员前往中国东北的建议。德拉蒙德对贾德干表示“日本政府很难反对这样的行动”,而且告知其已经对日本提出建议,“为了平息中国舆论,他们应该自发地邀请个别国家派代表到中国东北现场,以便告知本国政府关于满洲的局势

① “No. 559 Mr. Patteson (Geneva)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6 , 11.45 a. m.) ” , 6 October 1931 , F 5397 / 1391 / 10 , DBPO.

② “No. 562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Lord Tyrrell (Paris) ” , 6 October 1931 , F 5388 / 1391 / 10 , DBPO.

③ “No. 560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Sir M. Lampson (Peking) and Sir F. Lindley (Tokyo) ” , 6 October 1931 , F 5388 / 1391 / 10 , DBPO.

④ “No. 561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His Majesty's Representatives at Washington , Berlin , Rome and Madrid ” , 6 October 1931 , F 5388 / 1391 / 10 , DBPO.

⑤ “No. 566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7 , 5.0 p. m.) ” , 7 October 1931 , F 5388 / 1391 / 10 , DBPO.

⑥ “No. 569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7 , 4.0 p. m.) ” , 7 October 1931 , F 5485 / 1391 / 10 , DBPO.

⑦ “No. 570 Sir F. Lindley (Tokyo)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7 , 2.0 p. m.) ” , 7 October 1931 , F 5447 / 1391 / 10 , DBPO.

……该行动处于日本在理事会的声明^①和理事会决议的条款范围之内”。^② 德拉蒙德对施肇基则表示“大国发生了一些不幸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政府呼吁全体外交公使团派代表到中国东北的行动导致的”，“希望很快克服这个困难”，因为“国联确实应该从外界得到消息”。^③

兰普森、林德利、贾德干等人的电报已经基本上使英国外交部确定了需要赶紧派遣英国观察员前往中国东北。10月8日，李定又收到蒂勒尔发来的电报，报告法国驻沈阳的官员已经开展了对中国东北各处的调查，“日本政府不反对得到本国大使馆正式认可的代表前往中国东北”，法国政府甚至认为“如果有必要，这些报告可以非正式地提供给驻国联代表”。^④ 如此一来，李定对英国派遣观察员已经没有顾虑了，随即向兰普森发函要求其马上派员前往搜集有关中国东北局势的情报，包括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否得到保证，铁路区以外地方的占领或撤离情况、释放或拘留囚犯情况、收回或扣押铁路区域以外地区所占据的货物和财产情况等。^⑤ 兰普森亦正式命令军事武官和公使馆第三秘书斯特灵（Stirling）在助手们的陪同下于10月9日立即出发前往中国东北。^⑥

然而，局势的变化让观察员派遣再起波澜。就在英国观察员即将出发之际，日军轰炸了锦州，北平到沈阳的铁路也遭到轰炸而破坏，经陆路出关的通道被阻，观察员只能前往天津后轮渡至大连，再转沈阳。^⑦ 锦州轰炸进一步加重了东北局势，10月9日，施肇基向国联理事会发函要求立即召开会议。^⑧

兰普森于10月10日向外交部报告担忧“如果紧张局势持续下去，比如发生轰炸锦州的事情，我非常担心会爆发推翻政府运动”，并表示“无论日本是否同意都要派遣一个调查团进行调查。我相信（派遣调查团）可以缓解紧张，给双方一个喘息的空间，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在此期间，日本将不得不停止一切侵略行动或进一步侵占”。^⑨ 兰普森在该电报中所建议的调查团已经不同于简单的中立观察员，而是从第三国派遣中立观察员上升为由国联派遣调查团，两者在性质、依据、任务、职责等各个方面都不尽相同。10月12日，前往日内瓦准备参加第二轮国联理事会的李定会见了芳泽谦吉，李定表示国联本没有打算介入，但日本军队展开进一步行动，导致“国联不得不进行处理”。^⑩

10月13日，国联理事会再次召集会议讨论中日冲突，中国强烈反对直接谈判，要求国联介入。^⑪ 蒋介石在10月14日亦记载道“理事会必须尽其最高贵最重大之职责，日本与中国当信任国联。苟有国家不恤酿成巨祸，以致影响全世界者，必负可怖之重大责任。……又曰此次国联如仍决议不

① 1931年9月30日，芳泽谦吉在国联理事会发言中曾建议“理事会每一个成员都应该向秘书长发送各自政府在中国东北现场收集到的任何信息，这是可取的，有益于（日本）与理事会其他成员国沟通信息”，参见“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Fifth Meeting”, 4 p. m., 30 September 1931, LNOJ, p. 2308.

② “No. 567 Mr. Patteson (Geneva)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7 , 5.30 p. m.) ” , 7 October 1931 , F 5455 / 1391 / 10 , DBPO.

③ “No. 573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ir E. Drummond and Dr. Sze” , 7 October 1931 , F 5592 / 1391 / 10 , DBPO.

④ “No. 571 Lord Tyrrell (Paris)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8 , 9.0 a. m.) ” , 7 October 1931 , F 5453 / 1391 / 10 , DBPO.

⑤ “No. 577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Sir M. Lampson (Peking) ” , 8 October 1931 , F 5497 / 1391 / 10 , DBPO.

⑥ “No. 578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8 , 1.40 p. m.) ” , 8 October 1931 , F 5494 / 1391 / 10 , DBPO.

⑦ “No. 580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8 , 2.20p. m.) ” , 8 October 1931 , F 5495 / 1391 / 10 , DBPO.

⑧ “Letter from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Requesting the reconvention of the Council” , 9 October 1931 , Annex. 1344—X—13 , LNOJ , p. 2483.

⑨ “No. 603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11 , 4.30 p. m.) ” , 10 October 1931 , F 5616 / 1391 / 10 , DBPO.

⑩ “No. 620 Record of a conversation at Geneva between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and Mr. Yoshizawa” , 12 October 1931 , F 5854 / 1391 / 10 , DBPO.

⑪ “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 Eighth Meeting” , 12 noon , 13 October 1931 , LNOJ , pp. 2312—2313.

派监察团,或日方不接受,则我方决照国联争持。倘日方退出国联,则我方要求非战公约为仲裁也”。^① 10月14日,兰普森从北平前往南京,进一步与国民政府官员讨论中日冲突,蒋介石在同兰普森及各国公使的会谈中阐述了国民政府的三点要求:1.所有事情都尽可能尽快完成,任何延迟都会带来巨大危险;2.中立观察员应该指派前往观察撤军的进行;3.中国相信理事会在撤军完全实现之前不会休会。^②

但是,关于美国列席理事会的议案讨论占据了第二轮国联理事会的大部分辩论时间,中日冲突的处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国联通过了有利于中国的“10·24”议决案^③,却最终因日本的“五项基本原则”对策案^④和一票反对而失去法律上的约束性。

在国联理事会通过“10·24”议决案后,中国在国际舆论中获得了比较好的氛围,“一般舆论皆谓日已在道德上受一大创,并觉日本地位自始即无可维护”,且“国联办理此事可告无罪,政会之议案虽因日本反对而失效,但仍不失为世界最高公断机关慎思熟虑之公论”。^⑤ 蒋介石则一边对英国表示感谢,“特别感激作为英国政府代表的李定爵士和塞西尔勋爵的积极态度”,^⑥一边要求将议决案付诸实践,国民政府特外委于10月27日通过议决,应即发正式请柬,邀请中立国派遣代表。^⑦

随着中国外交部发出正式请柬,观察员派遣的性质再次发生了变化,即国联或中立国的观察员是否应中国政府的请柬而派遣,成为判断是否为第三方介入中日冲突的依据。早在10月13日,当英国确定要派遣观察员之后,日本驻北平的公使馆参事官矢野真就专门询问兰普森“他们的行动是不是接受了中国政府的邀请”,^⑧尽管兰普森没有正面回答,但日本对这一点非常在意。因此,在接到中国的请柬后,英国再度表现出暧昧的模棱两可立场,10月31日兰普森向国民政府传达了“(英国)没有理由成为其他人的避雷针”的立场,意即英国不应该“带头”,但又表示“只要其他公使团采取了同样的行动”,那么英国“会派遣那些最适合这个工作的人”。^⑨

某种程度上说,中立国派遣观察员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英国在围绕观察员问题上所出现的涉及是否派遣、何时派遣、如何派遣等外交折冲过程,充分反映了英国在处理九一八事变上的心境立场,即一方面寄希望于观察员能够获得实地信息,以促进国联做出正确的判断,增强国联维护和平的能力;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被日本视为介入中日冲突而伤及英日关系。英国也因此陷入双重窘境,既要派遣观察员,又不能带头采取行动;既赞同符合英国意愿的中国吁请,

① 《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年十月》,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入藏号:002000000521A,数位典藏号:002—060100—00041—014,第2页,台北“国史馆”藏。

② “No. 677 Sir M. Lampson (Nan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November 25)”, 22 October 1931, F 6889/1391/10, DBPO.

③ “10·24”议决案共有7项内容,具体可以参见“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Thirteenth Meeting”, 4 p. m., 22 October 1931, LNOJ, pp. 2340—2341.

④ 日本提出要同中国谈判确定解决九一八事变的“五项基本原则”,坚持要将此“基本原则”文本写入议决案,并将中日两国取得“基本原则”的谅解作为日本撤军的先决条件,国联理事会和中国都予以反对,具体参见“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Fourteenth Meeting”, 6. 15 p. m., 23 October 1931, LNOJ, pp. 2346—2350 《理事会決議案の修正について》(1931年10月23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第1卷第3冊,外務省1963年版,第398—400頁。日本外務省在10月26日发表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中公开了五项基本原则,即:1.互相否认侵略政策及行动;2.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3.彻底取缔一切有碍贸易自由及激起国际仇视的有组织运动;4.有效保障满洲各地日本侨民的一切和平企业;5.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益。参见《滿州事變に關する政府第二次聲明》(1931年10月26日),日本外務省編纂《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卷,第185—186頁。

⑤ 《道德上日本已受重创,国联尚可取进一步行动,白里安谓阴谋或将吹散》,《申报》1931年10月27日,第3版。

⑥ “No. 690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Received October 31, 9. 30 a. m.)”, 30 October 1931, F 6237/1391/10, DBPO.

⑦ 《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7日),刘维开主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81—84页。

⑧ “No. 623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Sir R. Vansittart (Received October 13, 9. 30 a. m.)”, 13 October 1931, F 5645/1391/10, DBPO.

⑨ “No. 697 Sir M. Lampson (Peking) to Mr. Ingram (Nanking)”, 31 October 1931, F 6240/1391/10, DBPO.

又不能被日本理解为支持中国。

四 调查团的组建: 英国主导国联权衡的政治过程

在10月24日议决第二次关于中日冲突的决议案后,国联理事会决定到11月16日继续开会。鉴于中日冲突尚未解决及第三轮国联会议召开在即,新任英国外相西蒙(John Simon)在11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有必要由他报告中日间在南满洲发生的困难问题,更多的是与即将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会议相关联”,^①英国内阁在时隔一个多月后,再次准备审议中日冲突。

11月11日,英国内阁继续开会,会议的第一项议事内容就是关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西蒙向内阁汇报了中日冲突及其处理的进展情况,并表示国联既无法使日本按照“10·24”议决案实施撤兵,又无法对日本实施撤回大使或限制贸易等制裁,而且若中国从国联盟约第11条转至第16条,^②会使英国陷入愈加为难的境地,因此英国希望能够避免中国提出依据盟约第16条进行申诉,同时继续依托国联框架来解决争端。内阁通过的政策基调是:(一)应该支持国联,既要让中国协助国联和不把责任推给安理会其他成员,又要让日本意识到作为国联主要创始国的责任;(二)英国采取“避免隐含威胁”的调停,安排双方在讨论条约权利的同时进行撤军;(三)维持现状,军事行动不能再加剧;(四)不要给媒体任何借口而使日本产生憎恨。

在英国确定应对第三轮国联理事会会议策略的同时,英国外交部收到诸多关于讨论组建调查团的信息。早在11月2日,为有利于国联处理中日冲突,德拉蒙德向美国代表基尔伯特(Gilbert)和英国代表贾德干询问国联是否可以援用《国联盟约》第15条第1款^③的规定,即“是否可以组建调查团对中国东北进行充分的调查”,德拉蒙德认为这样做能使(国联)在压力中得到舒缓。^④11月3日,兰普森向外交部报备表示美国公使约翰逊从国务院处得知只要国联会员国任命了观察员,美国就跟进采取同样的举措,李定则致电驻美大使林德赛(R. Lindsay),要求他向美国国务院解释只要其他国家公使派遣了代表,英国会“随时准备派遣代表”,^⑤英美双方都愿意任命观察员,但都不愿意带头去做。11月11日,法国驻英大使拜访了英国外交部,转告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Aristide Briand)的信函,其有意从国联派遣观察员以报告情况。^⑥白里安在11日这一天向中日两国发出呼吁,(中日)应对各理事会会员国派往事发地……搜集与9月30日议决案所规定之情报的观察人员予以便利。^⑦11月16日,塞西尔向西蒙提交备忘录,表示日本企图在中国东北设置保护区,可能会无限期推迟撤离,因此“只剩一件事,就是根据盟约第15条,组建正式的调查团,除非日本同意根据第11条进行调查”。^⑧

① “Conclusions of a meeting of the Cabinet held at 10, Downing Street, S. W. 1., on Tuesday, 10 November 1931, at 10.0 a. m.”, 10 November 1931, CAB 23/69/3, p. 6.

② 《国联盟约》第16条第1款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第12条、第13条或第15条所定之规约而从事战争者,则据此事实应即视为对于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其他各会员国应当立即与之断绝各种商业上或财政上之关系,禁止其人民与破坏盟约人民之各种往来并阻止其他任何一国,不论为联盟会员国或非联盟会员国之人民与该国之人民财政上、商业上或人之往来。”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国际条约集(1917—1923)》,1961年,第272页。

③ 《国联盟约》第15条第1款规定“联盟会员国约定,如果联盟会员国之间发生任何足以决裂的争议,而未按照第13条提交仲裁或司法解决者,应将该案提交理事会。为此目的,各方中任何一方可将争议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应采取一切措施,以便详细调查和研究”,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印《国际条约集(1917—1923)》,第271页。

④ “No. 702 Letter from Sir E. Drummond to Mr. Cadogan”, 2 November 1931, F 6355/1391/10, DBPO.

⑤ “No. 709 The Marquess of Reading to Sir R. Lindsay (Washington)”, 5 November 1931, F 6304/1391/10, DBPO.

⑥ “No. 722 Record by Sir V. Wellesley of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French Ambassador”, 11 November 1931, F 6655/1391/10, DBPO.

⑦ “Third appeal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to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governments”, 11 November 1931, Annex. 1344—XXXI, LNOJ, p. 2523.

⑧ “No. 739 Memorandum by Viscount Cecil (Paris)”, 16 November 1931, 349/1, DBPO.

随着组建调查团舆论氛围愈加浓厚,以及中国东北局势的发展,日本外务省在这个时候亦转变了对“观察员/调查团”的态度。在国联第三轮理事会召开前夕,日本外务省致函驻国联代表团,指示“为启蒙(国联)目的,推动让理事会派遣视察员赴当地是为为一策”。^①在国联理事会上公开提出之前,日本预先向英美等国透露,以试探效果。11月17日,日本驻国联代表团成员杉村向德拉蒙德、西蒙和美国的道斯(Charles G. Dawes)大使都传达了日本的建议,第一项是中日进行有关日本在中国东北安全利益的“五项基本原则”的谈判,第二项即“委派一个由X名成员组成的调查团,由国际联盟派往中国……以使理事会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审议”,^②德拉蒙德询问道斯关于美国的态度,得到的回答是“个人而言(美国)不会有任何困难”。^③

11月17日晚上,西蒙、塞西尔和德拉蒙德三位主导国联的英国人进行了私人会谈。塞西尔担心日本的建议会拖延撤军,违背了国联要求“撤兵应该在谈判之前进行”的原则,但德拉蒙德认为调查团的建议将与其他问题分开,不影响撤军,并指出了该建议对国联的好处,即“任何调查都可能需要大概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它的使命……它可能是最好的手段,将为国联提供一个机会来调查整个形势,而且整个程序将继续根据盟约第11条”,同时希望西蒙询问日本代表松平恒雄“日本代表团是否准备作为单独的建议提出,那将是非常有利的”,^④意思是要将第一项建议与第二项建议分离,不能捆绑。英国之所以对日本的建议较为支持,是因为调查团不仅不违背英国内阁的政策基调,而且有助于国联通过派遣中日双方都提议的调查团来缓解国联面临的压力。

11月18日,理事会成员国在中日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私人会议,白里安报告其与芳泽进行了沟通,确定日本提出的建议有三点:一是就“五项基本原则”进行谈判;二是国联派遣调查团前往中国调查;三是随时通报中日关于第一项谈判的进展情况。白里安还询问了芳泽关于撤军的时间,芳泽表示撤军可以同调查团的调查同时进行。西蒙比较关心的仍然是日本建议中的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关系,避免第一项成为第二项的先决条件。^⑤

11月19日,在向日本代表团进一步确认后,国联理事会再次召开除中日代表外的私人会议,主要是围绕日本提议派遣调查团的目的和是否应该召开理事会公开会议而进行讨论。塞西尔表达了对日本提议调查团的担忧,即“在等待调查的过程中,日本会保持占领满洲的状态”,也就是说英国认为日本会借此来拖延撤军,但是塞西尔也认识到国联的压力,表示在弄清楚日本于各个阶段对义务履行情况的前提下,“如果关于调查团的提议被提出的话(英国)已经充分准备好接受日本的提议”。^⑥在未印刷的一份私信中,塞西尔向西蒙简要概括了此次会议内容,其真实的想法是“无论是根据盟约第15条还是通过协议,当调查团成立时,我都会感到放心,否则中国人随时都会决定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并呼吁履行盟约第16条的义务,而这将使我们陷入一个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境地”。^⑦塞西尔的“放心”代表了当时英国人的立场,即避免触发盟约第16条,并且推动国联采取实质性行动。

① 《理事會對策ノ件》(1931年11月15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日支事件二關スル交渉経過(連盟及対米關係)第四卷,Ref. B02030391000,第143頁。

② “The Charge in France (Sha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7 November 193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ar East (1931), Vol. III, pp. 467—468.

③ “Enclosure 2 ‘Minute communicated by Sir Eric Drummond’ in No. 749 United Kingdom Delegate (Paris) to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November 19)”, 18 November 1931, F6715/1391/10, DBPO.

④ “Enclosure 1 in No. 749 United Kingdom Delegate (Paris) to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November 19)”, 18 November 1931, F 6715/1391/10, DBPO.

⑤ “No. 750 United Kingdom Delegate (Paris) to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November 19)”, 18 November 1931, F 6724/1391/10, DBPO.

⑥ “Enclosure 1 in No. 754 United Kingdom Delegate (Paris) to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November 23)”, 19 November 1931, F 6820/1391/10, DBPO.

⑦ “Footnote 3” in “Enclosure 1 in No. 754 United Kingdom Delegate (Paris) to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November 23)”, 19 November 1931, F 6820/1391/10, DBPO.

与此同时,一方面国联分别会见了日本和中国的代表,得到的回复是日本同意派遣调查团,而中国代表没有明确回答,称“中国不会以重新承认其认为无效的条约为代价来换取日本从中国领土撤退”,^①表明不会认可日本的“五项基本原则”;另一方面英国向驻中日使领馆发送电报,通报这几天的私人会议信息,尤其是向兰普森通报“日本有可能被劝说单独提出(派遣调查团)提议,而不是以五大原则为基础”,^②南京国民政府应该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目的是为实现满洲地区南满铁路和中国铁路之间的协议,以结束不合理竞争”。^③

经过一系列内部协商,英国与日本基本达成了关于组建调查团的建议,在11月21日国联理事会公开会议上,芳泽指出“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是对整个局势的真实了解,包括东北和中国本身”,建议“国联派遣调查团赴现场”。^④11月22日,理事会提出了一个议决草本,“决定任命一个由三名成员组成的调查团进行实地研究,并向理事会报告任何影响和平所依赖的国际关系、威胁中国和日本和平,或中日之间良好理解的情况。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都有权提名一名成员加入调查团”。^⑤11月23日,理事会成员国再次召集私人会议,商讨该议决草案。西蒙指出“决议草案的目的是使撤军问题和调查团问题完全分开。如果两者被联系起来,那就意味着撤军会被推迟,直到调查团前往现场检查情况”,因此他要求添加“调查团的审议不应被视为任何组织延迟撤军的借口”之类的表述。^⑥

在理事会讨论的同时,西蒙将此重要情况向英国内阁汇报,提交了一份外交事务备忘录,详细阐释了英国对中日冲突的理解,以及国联理事会的进展情况,该备忘录直接影响了英国内阁的决策。西蒙的备忘录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是英国外交部对九一八事变的认识。英国外交部首先指出局势的严重性,“国联理事会所采取的决定将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英国代表在国联讨论最后时刻所扮演的角色会成为影响英国和中日关系的因素”,认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的一次精心准备的政变,并继续执行同样精心准备的计划”,日本借口保护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越过铁路线范围,占领了满洲各处……逐渐演变成了一次有组织的侵占行动,转向了严重的战争与轰炸”。第二,是英国外交部对派遣调查团的立场。关于调查团,英国外交部指出日本代表提议调查团应该考察中国东北地区和关内,中国代表团表示从原则上不拒绝调查团提议,但“不应该成为日本延迟撤军的借口”,英国亦同意派遣,“调查团毫无疑问能够提供很多关于当前还很模糊或中日双方进行争论的要点的有用信息”。第三,是英国外交部对此次国联议决案的评估。英国外交部的评估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部分成功的情况下,接受已经提交给当事国的决议”,理事会将派遣调查委员会,最终会产生有价值的结果,但这种情况隐含了“理事会没有实现立即终止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目标”;第二种情况是“未能确保通过正在讨论的决议”,那么“很难看到理事会在本届会议期间可以在任何其他方向寻求解决方案”,至多“重申9月30日的决议,并再次提交正式记录,重提双方的义务”,其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会根据盟约第15条提起新的诉求,理事会不仅必须“在中日双方独立之外派遣调查团”,而且面临“更加险恶的氛围”。第四,是英国的应对策略。西蒙主要提出如果理事会派遣调查团,但是没有制止日本继续侵略,英国该如何应对。在这个时候,英国需要考虑到带头发表声明而必定冒犯日本的得与失,“一方面,直接的不利影响就是英国失去日本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拒绝重申(国联)真正的职能,国联将因未能履行申诉者的要

① “No. 758 Lord Tyrrell (Paris) to Sir M. Lampson (Nanking)”, 20 November 1931, F 6803/1391/10, DBPO.

② “No. 752 Mr. Campbell (Paris) to Sir M. Lampson (Nanking)”, 19 November 1931, F 6749/1391/10, DBPO.

③ “No. 753 Mr. Campbell (Paris) to Sir M. Lampson (Nanking)”, 19 November 1931, F 6752/1391/10, DBPO.

④ “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Eighteenth Meeting”, 4.30 p. m., 21 November 1931, LNOJ, pp. 2365—2366.

⑤ “Enclosure 2 ‘Draft Resolution’ in No. 770 United Kingdom Delegate (Paris) to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November 24)”, 23 November 1931, F6715/1391/10, DBPO.

⑥ “Enclosure 1 ‘Record of a Private Meeting of the Council on November 23’ in No. 770 United Kingdom Delegate (Paris) to Foreign Office (Received November 24)”, 23 November 1931, F6715/1391/10, DBPO.

求而失去尊严”不再是维持世界和平的组织。^①

11月25日,英国内阁开会,第一项议题就是根据西蒙的备忘录讨论“中日在中国东北的行动”,内阁商议后的决定是支持派遣调查团,还规定“内阁支持白里安基于理事会利益指出国联的基本原则;并对目前满洲争议中不能进一步适用这些原则表示遗憾;同时反对英国代表采取一种特殊和独立的立场;建议英国代表应该尽其最大努力……私下要求理事会主席以整个理事会的名义发表产生这一效果的声明”,英国针对中日冲突的政策基调是一方面不愿带头针对日本,即不采取“特殊和独立的立场”,另一方面试图继续推动国联来促成有关中日冲突的处置。^②

在英国内阁取得一致意见后,国联的英国代表团迅速推进理事会进程。西蒙将内阁的决定传达塞西尔,“内阁反对英国代表在公开会议上采取特殊和独立的态度”,需要“集中精力让德拉蒙德……为白里安准备好议决草案”。^③11月26日,塞西尔和贾德干已经草拟好了提供国联理事会在通过派遣调查团议决案后的声明,并向西蒙征求批准。该声明反映了英国对组建调查团的支持和期待,“当得知日本政府提出组建调查团时,(英国)表示欢迎……对整个问题的彻底调查可能为全面而持久的解决铺平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任务已经被日本提议进行调查扩大了。理事会现在将有机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并试图找到一个更持久的解决办法,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情况再次发生”。^④西蒙对声明表示“完全赞同”,并允许塞西尔在遵守内阁决定的前提下,“全权斟酌……建议以白里安的名义发表”^⑤,同时决定成立议决案的起草委员会,“由白里安、西班牙代表、挪威代表和塞西尔组成,以协调各方对决议文本的要求”。^⑥12月2日,西蒙向内阁汇报“国联理事会已经同意关于满洲问题的议决案和白里安的解释说明,中日冲突问题在现阶段有达成解决的充足前景”。^⑦

如此,在英国主导之下,国联理事会加快了起草议决案和有关议决案的辩论程序,尽管中国对此曾表示犹豫,并提出对策案等,^⑧但最终在12月10日一致通过了有关组建调查团的议决案。^⑨国联调查团终于实现了从提议到预演再到组建的进程,中日冲突随即进入了国联调查阶段。

结 语

对国联调查团组建的研究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忽视,一方面是因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重要性使得研究重心偏向解读和批判报告书,另一方面是由于从因应九一八事变的整个过程来看,国联调查团组建不是历史主要方面。然而国联调查团及其组建的历史地位不容忽视,其不仅深刻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初期的国家关系与国际局势演变,而且是联结中日战争与国际联盟的关键所在。通

①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23 November 1931, CAB 24/224/29, pp. 1—7.

② “Meeting of the Cabinet to be held at No. 10, Downing Street, S. W. 1., on Wednesday, November 25, 1931, at 11.0 a. m.”, 25 November 1931, CAB 23/69/10, pp. 1—3.

③ “No. 775 Sir J. Simon to Lord Tyrrell (Paris)”, 25 November 1931, F 6938/1391/10, DBPO.

④ “No. 782 Lord Tyrrell (Paris) to Sir J. Simon (Received November 26, 11.40 a. m.)”, 26 November 1931, F 6939/1391/10, DBPO.

⑤ “No. 784 Sir J. Simon to Lord Tyrrell (Paris)”, 26 November 1931, F 7028/1391/10, DBPO.

⑥ “No. 786 Lord Tyrrell (Paris) to Sir J. Simon (Received November 27, 9.0 a. m.)”, 26 November 1931, F 6980/1391/10, DBPO.

⑦ “Meeting of the Cabinet to be held at No. 10, Downing Street, S. W. 1., on Wednesday, 2 December 1931, at 11.0 a. m.”, 2 December 1931, CAB 23/69/13, p. 18.

⑧ 参见《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22日),刘维开主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47—151页;《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24日),刘维开主编《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第155—158页。

⑨ 关于议决草案的内容和议决过程可以参见“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Nineteenth Meeting”, 5 p. m., 9 December 1931, LNOJ, pp. 2374—2375; “Appeal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der Article 11 of the Covenant, Twentieth Meeting”, 4.30 p. m., 10 December 1931, LNOJ, pp. 2376—2377.

过英国档案审视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可以发现作为主导国联的英国在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中存在复杂深刻的外交运作与政治权衡过程,国联调查团的组建离不开英国因素。

首先,英国与国联调查团组建相关联的历史过程中存在三个空间场域:英国内阁、英国驻中日使领馆、英国驻国联代表团。这三方基本上构成了英国决策与实践的主体,有助于理解英国远东政策的依托基础、形成机制和实践过程。其次,英国驻中日使领馆的信息报备对英国确定远东策略至关重要,直接为内阁提供了中日两国的情势发展信息。而信息报备的差异性既体现了中日两国政府对驻本国外交使团的影响力,也反映了英国确定远东政策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再次,九一八事变后的观察员派遣是国联调查团的“前奏”,其不仅巩固了中国的初心,即坚定地依靠国联,积极吁请介入调查,而且迫使日本改变强硬立场,即从坚决反对第三方干涉到同意派遣调查团。最后,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组建过程中的立场始终存在“摇摆”现象,陷入国联威信和英日关系之间的纠葛中。作为国联的两大主导国家之一,英国期望日本能够撤军而和平地解决九一八事变,以维系国联在会员国心中的地位,但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庞大利益需要通过良好的英日关系来实现,故不能带头提出使日本不满的建议,更不能率先实施使日本反感的行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调查团的组建费时颇久,九一八事变的调查和解决亦随之延时,间接给予了日本时间以消化事变“果实”和策划“满洲国”,不断侵蚀远东和平国际秩序。

总之,作为国联主导国的英国及其英国档案,提供了认知九一八事变后外交和政治发展演进的不同路径,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联调查团的组建过程及其背后的国家角力,这对深化国联与中日战争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在国联理事会通过组建调查团的决议后,英国是如何具体地安排调查团委员的构成,英国人李顿在怎样的情势中成为调查团团长等,都是未来进一步推进研究的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李顿调查团档案翻译与研究”(16KZD017)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林超超)

lation of rural documents was the expression of “township” and “countr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trend. In this period , there were some “modern” elements involved in the collation of Wenzhou documents , but on the whole , it’s still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 Study Based on British Archives **CHEN Hai-yi , Xu Tian-na**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 the League of Nations sent a fact-finding mission to the far East to investigate. Britain , as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fact-finding Mission. The British Cabinet , the British Embassy and Consulate in China and Japan , and the British delegation to the League of Nations formed the tripartite main body in the process , and played an effective role in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proposal-rehearsal (sending observers) -formal form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fact-finding Mission. The formation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 fact-finding mission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British factor.

Chiang Kai-shek’s Command over Echelon and the Nationalist Army’s Internal Logic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HEN Mo**

Regardless of the Nationalist Army’s regular commanding system , Chiang Kai-shek used to make telephone calls , send cipher telegrams , and give personal orders to the troops at the frontlin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wartime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Nationalist Army , while it remained consisting of many military groups from various regions. Thus the Nationalist Army had to be run in accordance with a special internal logic. Chiang’s command over echelon might prove to be an outcome of it. By transmitting messages to the field commanders directly , Chiang tried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military groups and held back his own generals’ resentment. Chiang’s command over echelon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wer relation in the Nationalist Army , as well as the result of the power shift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al authorities.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after the World War II

JIANG Wen-jun

For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 which began in 1946 with the CPPCC meeting as the trigger , the evaluation of the history itself was still a matter of opinion and confusion.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interpret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after th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This paper treats the urban middle class (represented by Shanghai) as one of the main social forces on which the third force movement depended. In essence , the movement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continuous decline and disappearance during the civil war.

New Perspectives and New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ZHANG Jun-feng**

As a branch and hot field of social history , the history of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has developed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water conservancy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has received different degrees of practice and respons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water conservancy social history in different regions keep emerging , showing vigorous vitality.